

【办学理念】

西北大学区域定位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姚 远

(西北大学 学报编辑部,陕西 西安 710069)

摘 要:通过校史文献考证,意于廓清西北大学 100 多年来依托西北兴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脉络。认为关中—陕西—西北—西部—全国—世界的互逆循环过程或关系,表现了这种进化轨迹,尤其是其中作为“根”、“根据地”和“立足地”的陕西最为重要。这一思想,在清末酝酿,在民初大致成熟,在抗战时期得以实践和发展,建国以来有反复和调整,并形成完整的思想体系。

关键词:清代末年;民国初年;抗日战争时期;西北大学;区域定位;西北;兴学思想

中图分类号: G5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731(2006)01-0010-05

一、清末的酝酿

早在清光绪二十三年(1898),陕西巡抚魏光燾即上奏:“现在京师设立大学堂,天津上海奏设头等学堂,其东南各省或立书院讲求实学,或就现有书院更变章程纲举目张,均有起色。国家需才孔亟,即在偏隅亦应设法筹办,以收鼓舞振兴之效。陕省为文献旧邦,历代以来名臣大儒辈出……”,“河岳灵秀之区,必有奇才异能奋发而起”,“窃维图治之本,尤以兴学育才为亟”^[1]。这就是陕西大学堂的前身游艺学塾(又名格致学堂)在西安崇化书院旧址创办的前奏。它是在西北首善之区或西安这个“河岳灵秀”之区创设新学的开端,也是西北大学奠基的先声。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陕西巡抚升允上奏在游艺学塾基础上设立陕西大学堂时,对这种区域兴学思想有了新的认识,即“陕西地方僻远,不同于朝求夕应之区”,由地方情形不能强以相就”,“大学堂为全省学堂总汇之所”,“他省以致用为期,必取少年英发之选,陕省以乏师为虑,先求老成速效之人。将来各府州中学堂,各州县小学堂所需教习即就大

学堂中遴选,不复取材于异地,便益甚多”^[2]。这是陕西汲取山东、江浙、京师等地区兴学教训,适应陕西区域特点,对办学规模、师源、生源、办学思想等所做的适当调适。这也是陕西大学堂学生年龄有 18 岁至 35 岁之差的由来。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改陕西课吏馆为陕西法政学堂时,“培养人才为致治保邦之本”的区域兴学思想开始逐渐清晰化。陕西课吏馆原本就是在“为政之要,首在得人”和培养地方官吏的初衷下创办的,改为法政学堂以后,这一思想开始作为办学宗旨。这就是:“为致治保邦”,“改良吏治,培养佐理新政人才为宗旨”。这是因为:“陕省风气之开,后于东南各省”,故“人才消乏,诸事待理”,“需次人员,奚啻千百”。所以,法政学堂的学子,既要“上任朝廷维新之政”,又要“下以慰闾阎望治之心”。具体的:“陕西地方简僻,官场风气较谨,当保其所固有,增其所未能”,“以才识,品行为教育之宗旨,以考言询事为鉴别之准绳”,“必使作宦者,皆娴吏事,皆能听断,皆不敢贪污”,“务宜心存正大,品务端方,学究本源,才求谄练,以仰副国家甄材佐治之

收稿日期:2005-11-05

基金项目:教育部软科学研究重大项目(2004-83);陕西省教育厅专项科研基金项目(05JK114)

作者简介:姚 远(1955-),男,陕西岐山人,西北大学编审,从事科学史研究。

意^[3]。总之,地方兴学,就首先要为地方培养人才,而且要培养与地方风气相适宜的人才,既要为朝廷负责,也要为地方负责,这就是法政学堂所创地方学校“致治保邦”办学思想的主旨。清末陕西课吏馆,陕西法政学堂的创建和相沿发展,奠定了西北大学法政学科的基础和培养地方官吏的一贯宗旨。作为西北大学陕源的一个重要支脉,它与其后由西北大学改设的陕西法政专门学校、西安中山大学,以及抗日战争时期与陕源合流的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共同构成了陕西地方乃至整个西北地区培养法、政、商人才的重要基地。

二、民初的成熟

民初张凤翔将五学堂合组为西北大学时期,立足西北办学的思想更为明确。

首先,西北大学校名的确定即足显依托西北的兴学思想。组校之初,先有“关中大学”之称,显然在区域面上比陕西还要狭窄。西北大学创设会会长、陕西大都督张凤翔最终还是决定校名冠以“西北”。他指出:“武昌起义,秦中继起,甘新僻远,亦举义旗,比较东南,未遑多让。自统一政府成立之而后,服务中央者,西鄙之人,乃落落如晨星,非勇于破坏,不懈于建设,人才难得,无可如何,不得不谗卸于东南诸贤,使之独任其艰巨。国民责任之谓何,无以对国家,尤无以对东南各省,为求根本之解决,固之有西北大学之发生^[4]。学校也在“致部视学说明本大学开办各科之大要”中,从“历史上之必要”,“地理上之必要”,“各界需材之孔急”等三个方面表明依托西北改名建校的理由。

第二,西北大学的创建关系到西北的“现时之建设”、“将来之建设”和“外部之防御”。张凤翔指出:“东南风号开通,具有高尚知识者所在多有,尚力图进步,急急然有南京、广东、湖北大学之经营。西北闭塞日久,若不早为培植,恐愈趋愈下,将来文武法官之考试,西北必少合格人才,东南纵号多才,未必能敷全国之应用,即使敷行政机关之用,而地区所限,于立法机关将奈何?以不健全之分子,而畀之以立法之特权,影响所及,良非浅鲜。一肢痿痺,累及全体,西北不竞,岂国之福^[5]。”

这是将西北大学与西北兴衰和西北国防安全相联系的一个最完整,最明确的诠释。

第三,既立足西北,又不囿于一隅,游学东洋,面向世界办学,是西北大学区域兴学思想的一个升华。清末已站在陕西的区域立场,对面向世界办学有了

一些认识。陕西巡抚曹鸿勋指出:“近来各省人士游学东洋者三千余人,而陕省游学者则寥寥无几。江楚等省于学校管理,师范教育之法考察访问精益求精,而陕省学堂则无出洋考察之举^[6]。陕西布政使,高等学堂监督樊增祥也指出:“自同治间,湘乡奏派学生出洋游学,天下从风……湘鄂诸生遍布环球学校,独吾陕阙如焉^[7]。这是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陕西第一次大批送出留日学生(陕西高等学堂仅有不到十人)的申奏理由,这批学生回陕后成为民元合组西北大学的校政和师资骨干,印证了“游学之见功最速”的预言。

到了民初,西北大学合组以后,鉴于前身的成功策略和西大当时捉襟见肘的办学条件,遂有第二批留学东洋之举。西北大学派出文法商农预各科官费留日学生47人,自费生15人,共计62人出行。然而,这一次,已非仅为陕西着想,而是“都督怀西北前途,不惜为剜肉补疮之计,而亟亟以兴学育才为要,图莘莘学子^[8]。文科学长崔云生,在勉励留学生时,不仅希望“学成归来,无负三秦父老昆仲之望”,同时也希望“志向务须远大”,“他日学成归国,扶持世运,巩固共和”,“西北长城惟君是赖^[9]。之后的国立西北大学校长李仪祉的《教育家的眼界》,很能说明西北大学这种区域眼界从关中—陕西—西北—全国—世界的进化轨迹。他认为:“教育家之目的以教育之眼界为准……教育发达之历史直可谓之教育界之眼界扩张的历史。可分为四阶级:一身家,二社会,三国家,四世界”。身家就是“一身”和“一家”;社会就是“无数小团体”;“为御外侮计,不能不合无数之团体,而成为国”;然“各国各有特别教育方法,无非自谋富强其国”,“有数国教育不期然为世界教育之前导”,而“吾国以新造之邦,共和初建,国基未固”,故“眼界不能不注射于世界教育^[10]。李仪祉早在西大的前身之一三秦公学即创设留学预备科,之后又两度留德,出任西北大学校长以后,也立足陕西水利建设和在西北大学培养所需工程技术人才,全面引进西方现代水利科学和教育思想,可谓陕西近现代以来倡导立足陕西,面向世界教育之第一人。

三、抗战时期的实践和发展

抗战时期的国立西北大学校长赖琏把西北大学远承周秦汉唐文明,近负建设西北新文化的责任首次上升到了“使命”的层位。他指出:“国立西北大学创设陕西,吾人远观周秦汉唐之盛世,纵览陕甘宁

青新区之广大,不惟缅怀先民之功绩,起无限之敬仰。……故恢复历史的光荣,创建新兴的文化,实为西北大学所应负之使命^[11]。他在西大任内的抱负就是要“使西北大学成为名副其实的西北最高学府^[12]。抗战时期西大的另一位校长刘季洪也有“为西北建立高等教育基础”的任内目标^[13],并在任内积极推进西北方言研究。

刘志聪的《西北最高学府的风光》一文则称“西北大学是大西北的司令台,它的使命很大”!他还 将抗战时期的全国大学分为三个大学区:“第一是南郑区(西北联大所在地);第二是昆明区(西南联大所在地);第三是四川区(内迁学校集中地)。这三个地方……俨然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三大堡垒”。“抗战发生,平津不守,冀舍播迁,国人眼光始渐向西北转移,西北遂成为民族复兴的根据地,西北各院校也就在‘建设西北’,‘完成国防根据地’这个要求下建立起来”。“西北为吾国文化发祥之地,所谓民族固有道德,实孕育于此,恢复固有文化,固全国大学之责,而西北大学以地理关系,尤应特别努力”。“此外,改良西北司法,澄清西北吏治,发展西北经济,畅通西北国际贸易,皆西北大学应有的责任”。“战后第一步迁回西安……设分校于兰州……并在新疆迪化设分校,与美国西北大学并存于世界^[14]”。著名教育学家姜琦在谈到西北大学的这种使命感时,指出:过去的大学皆为沿江河而建或沿铁路线而建的形成若干个“线”或“点”的大学,这些大学虽在战时迁至内地,却随时会回迁原地,只有西北大学,——“由‘点’‘线’的大学转变为‘面’的大学”,将“化成为西北自身所有、永久存在的高等教育机关”。“所以,现在的西北各大学之任务比之原有的东南,西南及东北各点或各线上的各大学之任务,其重大之程度,不啻是原来集中于各点及各线之上的一切大学之基石。这一块基石,又像一颗钢钻。它所发出的诸光线,是先有体而面,再由面而普照于一切线或一切点之上,然后使任何一线或任何一点吸收去作为它自身的光线之导源而有所发扬光大一般^[15]”。这无疑是在抗战时期从高等教育学学理层面对西北大学区域办学使命最深刻和最科学的一个阐释。

黎锦熙教授在阐释西北大学校训时也指出:“‘公诚勤朴’校风之养成,盖与西北固有优良之民性风习相应”。“西北民族杂居,异于东南,而其开化亦久,异于西南;融为‘国族’正学府之任务矣。四千年使华夏之雄风,宁以遇暴敌而遂摧挫?惟在西北,必借教育学术之力,努力铸成‘国族’以发扬

之。西大之责,无可旁贷^[16]。

西北大学在抗日战争时期的陕南 8 年中,的确在西北矿产资源调查和开发、西北史地研究、西北考古、西北民族研究、西北科学文化考察、西北教育等方面为西北文化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积极地实践和发展了依托西北办学的思想。

四、建国以来的反复和调整

建国前夕的西北大学校长杨钟健,上任伊始的第一次校务会议就宣布:“我这一次来西北大学,绝不是来维持现状的,我对西大有一种抱负,希望能把西大办成进步的、充实的、合理的、名副其实的西北学府^[16]”。

建国以后,区域办学思想有过一些迷惘和反复,特别是在 1959 年学校由教育部改隶陕西省以后,至 20 世纪 80 年代末,这种迷惘尤甚。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211 工程”申报和建设过程中,我们才再次明确了思路。

1996 年 10 月制定的西北大学“211 工程”建设总体目标明确要把西北大学“建设成为有特色的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综合大学……成为促进陕西和西北区域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

1999 年,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西大适应国家总体战略,逐步将区域范围由“西北”扩为“西部”。

2001 年 3 月学校通过的《西北大学“十五”事业发展规划》将区域范围修改为“将西北大学办成国家和地方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的重要基地,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和科教兴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持和智力支持,成为知识和技术创新、推动科技成果产业化重要力量,向研究型、具有特色的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综合大学迈进”。

2004 年,在教育部的本科教学评估中,提出了:“立足陕西,服务西部,面向全国,走向世界”的思路。这是西北大学区域办学思想距今最近的一个表述。其实,从历史的发展来看,它并无新意,但却符合自清末 100 多年以来西北大学区域定位逐渐扩展的基本进化轨迹。

五、结 语

(1)总之,西北大学从陕西大学堂、陕西法政学堂、陕西法政专门学校,直到北平大学法商、文理学院以来形成的人文、法商、自然科学等作为主干的学术传统,成就了一批学术大师,形成了立足西北办学的

区域定位和办学思想,形成了“公诚勤朴 自强不息”的校风或校训。它将西学系统地引入陕西,辐射整个西北,作为西北高等教育的“工作母机”,开创了西北新学体制,也将新的思想播撒到这片广袤的土地。它不仅是一所西北最高学府,也是近代秦文化和西北文化的策源地,其民风教化、文治武功和开创新学、创建新西北文化的功绩彪炳史籍,千秋不没^[17,18]。

(2) 在西北大学这 100 多年来区域兴学思想的扩展中,关中—陕西—西北—西部—全国—世界,其实是一个互逆、循环的过程或关系。其中,从陕西区域向西北区域的扩张是一个重大步骤,从西北区域再向西部区域或向全国范围扩张已超出了校名所规定的界限,只不过是体现了国家意向,与学校的定位无关宏旨。然而,从陕西或西北区域走向世界,鉴于现代科学的无国界性和信息社会的无民族性,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无论区域范围的扩张有多大,其中“根”、“根据地”、“立足地”可能是最为重要的,因为它是一切“服务”、“面向”、“走向”的基础。

(3) 区域特色是一切事物最为显著的特征之一,随着岁月的流逝,有些特色会时过境迁,不复存在,但区域特色却很难失去,几乎像是与生俱来的胎记,相伴终生。虽说大学并非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所直接赋予,但这种环境毕竟提供了它生存的氛围、物质材料、文化营养,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其发展的趋向、规模和色彩。虽说科学日益国际化,已根本不存在“美国物理学”和“中国物理学”之分,但当科学技术日益转化为一种文化,就会带有地域特色。无论一所大学地域性发源特点的现代价值如何,但当我们追溯其源流而上时,却总发现它是当地区域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4) 办学理念是一个包括认识、思想、精神、价值观、定位、信念、意识、理论、理想,或者目标、宗旨、追求、愿景的复合概念。它“不是人为设定的,也不是哪位校长或大师头脑中的理念产物。它是介乎理性与情感之间的一个范畴,它的形成是多重因素长期相互撞击和融汇的结果”^[19]。西北大学区域定位思想的形成正是在其独特的历史、地理环境、文化环境,以及国家意向、社会发展趋势中逐渐形成的。史实表明:校长、学术大师、学派、学会、学术期刊,以及学生中的精英都可能对这种理念产生重要影响。因此,激扬师生爱校爱国的主人翁意识和使命感、营造有特色的校园文化、将校史凝固于校园、培育文理融通、人文与科学交相辉映的氛围,是大学精神文明建

设的重要内容。

参考文献:

- [1] 魏光焘. 奏设游艺学塾疏 [A]. 杨德生, 崔智林, 姚远. 西北大学教育理念文选 [C]. 西安: 西北大学出版社, 2004.
- [2] 升允. 为遵旨升办大学堂拟订详细章程奏明立案 [A]. 杨德生, 崔智林, 姚远. 西北大学教育理念文选 [C]. 西安: 西北大学出版社, 2004.
- [3] 曹鸿勋. 奏遵设法政学堂析 [J]. 秦中官报, 1907, (4): 177-178.
- [4] 张凤翔. 给教育部的信 (1912) [A]. 杨德生, 崔智林, 姚远. 西北大学教育理念文选 [C]. 西安: 西北大学出版社, 2004.
- [5] 曹鸿勋. 为派学生游学东洋并派员出洋考察奏折 (1905 年). [A]. 杨德生, 崔智林, 姚远. 西北大学教育理念文选 [C]. 西安: 西北大学出版社, 2004.
- [6] 樊增祥. 送陕西高等学堂学生留学东洋序 [J]. 秦中官报, 1905, (1).
- [7] 钱鸿钧. 送西北大学学生留学东洋序 [J]. 学丛, 1913, (2).
- [8] 崔云生. 送西北大学学生留学东瀛序 [J]. 学丛, 1913, (2).
- [9] 李仪祉. 教育家的眼界 [J]. 三秦公学一周年纪念刊, 1913.
- [10] 赖琏. 题词 [J]. 西北学术, 1943, (1).
- [11] 赖琏. 一个最愉快的回忆 [A]. 尹雪曼. 国立西北大学建校卅周年纪念刊 [C]. 台北: 国立西北大学校友会, 1969.
- [12] 刘季洪. 国立西北大学回忆记略 [A]. 尹雪曼. 国立西北大学建校卅周年纪念刊 [C]. 台北: 国立西北大学校友会, 1969.
- [13] 刘志聪. 西北最高学府的风光 [J]. 西北学报, 1941, (1).
- [14] 姜琦. 西北大学像一块基石又像一块钢钻 [J]. 西北学报, 1941, (1).
- [15] 黎锦熙. 国立西北大学校史 (1943) [A]. 尹雪曼. 国立西北大学建校卅周年纪念刊 [C]. 台北: 国立西北大学校友会, 1969.
- [16] 杨钟健. 在地质系的讲话 [J]. 地质通讯, 1949, (2).
- [17] 姚远, 柏一林, 徐怀东. 《西北大学学报》的孕育、诞生及其社会地位 [J]. 西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3, (4).
- [18] 姚远. 《西北大学学报》的赓续和演变 [J]. 西北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03, (6).
- [19] 吴传喜. 大学精神: 高校综合竞争力的核心 [N]. 中国教育报, 2005-11-15.

[责任编辑 柏一林]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Idea of the Regional Location of Northwest University

YAO Yuan

(Editorial Board of the Journal of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069, China)

Abstract: Through the textual research of the school history, we are going to clear the line of thought of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idea of rejuvenating Northwest University relying on the northwest regions in the past 100 years. The paper believes that the reciprocal cycling process and relationship of the Central Plain of Shaanxi-Shaanxi-northwest regions-west regions-the whole nation revealed this trail of evolution. Shaanxi Province, which has been regarded as the "root", "base" and "foothold",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rejuvenating the school. Formed in the late years of Qing Dynasty and roughly matured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thought of running school relying on the northwest was practised and developed.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idea has been adjusted and formed an integrated thinking system.

Key words: in the late years of Qing Dynasty;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Northwest University; regional location; the idea of rejuvenating schoo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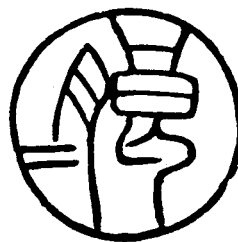
唐长安佛寺何者最大

唐时长安因地处京城,不仅城内佛寺数量众多,而且因不少佛寺的创建多与帝王或达官显贵相关涉,因而其规模也非外州所能比。圆仁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四中曾说,“长安城里坊内佛堂三百余所,佛像、经楼等庄严如法,尽是名工所作,一个佛堂院,敌外州大寺。那么,长安佛寺的规模究竟有多大?又以何者为最?如就现在所见资料来看,则章敬、西明、慈恩三寺最为瞩目。章敬寺,宋敏求《长安志》云其“总四千一百三十余间,四十八院。内侍鱼朝恩请以通化门外庄为章敬皇后立寺,故以章敬为名。……是庄连城对郭,林沼台榭,形胜第一。鱼朝恩初欲得之,及是建寺,穷极壮丽,以为城市材木不足充费,乃奏坏曲江亭馆、华清宫观风楼及百司行廨,并将相没官宅,给其用焉。土木之役,仅逾万亿。西明寺,据慧立、彦r《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十载,则是“廊殿楼台,飞惊接汉,金铺藻栋,眩目晖霞。凡有十院,屋四千余间。慈恩寺,宋敏求《长安志》谓其“凡十余院,总一千八百九十七间。敕度三百僧。”三寺俱可谓规模宏伟的寺院,然比较而言,章敬寺则堪称其中之冠。

(李芳民)



蓝天



朗月

(篆刻:柏一林)